

历史转折时期 的政要名人传

《非常抉择—历史转折时期的政要名人沉浮录》

目 录

（上卷）

【中】李达 （猿）

对党员的判断，仅仅凭借一张党证做依据，未免太过简单。李达这个“红色教授”，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吗？

最大的转折 （猿）

白色恐怖下的信仰 （猿）

改造“武大” （猿）

【中】陈公博 （猿）

党的一大代表，脱党的有好几个。脱党后当汉奸，却因传

统文化中的忠义成分使然！怪不怪？！

第一次选择——入党与脱党 (猿源)

第二次选择——跳水作汉奸 (猿源)

【中】摇顾顺章 (猿怨)

在历史关头，顾顺章由入党到叛党，其抉择不仅对个人，
更对历史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风起云涌的时刻 (猿怨)

几乎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事件 (源苑)

源月 圆日 (源怨)

【中】摇赵世炎 (源园)

年轻而又较深厚理论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有机统一，使之
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到上海没多久，便使当地的工人佩服
之至……

上海罢工与武装起义前后 (源园)

【中】摇缪伯英 (源缘)

小“桃哥”少年立大志，以优异成绩考往“五四”运动发源

地的北京。就是这样一位女青年,很快地,成为全国第一名女党员,并组织起了“工读互助团”,引起一片震动……

- “工读互助团”前后 (源缘)
“二·七”大罢工期间 (源颢)
大革命失败前后 (源园)

【中】**摇向警予** (源源)

“向蔡同盟”,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多么响亮!一个旧社会的普通妇女,何以选择革命的道路,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所不惜?

- 向蔡同盟时期 (源源)
大罢工期间 (源毅)
“四·一二”前后 (源毅)

【中】**摇蔡畅** (源颢)

革命的老大姐,这是人们对她的称呼,也是对她的尊敬。这尊称的背后,有着一段怎样的原委呢?

- 北伐前后 (源颢)
大革命失败后 (源园)
长征时期 (源源)

抗战爆发后	(源苑)
布达佩斯的轰动	(源园)

李摇摇达

【中】 摇李达

李达（~~员愿年~~原~~员愿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共创建活动参加者之一。湖南零陵人。~~员愿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员愿年~~参加党的一大。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国统区坚持马克思主义教学和宣传工作。建国后，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校长。~~员愿年~~愿月病逝于武汉。

摇摇摇摇摇摇题摇摇说

对党员的判断，仅仅凭借一张党证做依据，就未免太过简单了。李达这个“红色教授”，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吗？

最大的转折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李达仿佛看到了中国社会冲出黑暗的灵光，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很快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此后，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事业。李达终于完成了他生活中最后一个转折，而这个转折的引发点是1919年缘月的反段爱国斗争。

1919年缘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了猿日留日学生的强烈义愤。缘月猿日，留日学生决定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并决定由各省各校留日学生派遣先返队分赴北平和上海，筹备一切。李达被湖南学生选为代表并为救国会骨干。他们五月中旬到达北平，受到以许德珩为首的北平大学学生会的热烈欢迎。经过数天的奔走呼号，于缘月圆日组织了留日学生和北平各校约两千余人的情愿示威活动。这次运动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而李达是这次运动的骨干，功不可没。他从这次运动之中，感到自己以前“实业救国”的理想只不过是幻想，开始意识到，要救国“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这样，在一次次的希望与幻灭之中，李达终于找到了解开中国问题

的金钥匙——马克思主义。

1919年远月，李达完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毅然三渡东瀛，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全部精力放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五·四”风暴，点燃了李达这位马克思主义信徒心中的圣火。尽管身寄东瀛，但他丝毫没有置身事外。他虽然不能亲自到游行队伍中去冲锋陷阵，但他却首次以一位非凡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身份，以笔代戈，说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想说却未能说出的话，干了许多人想干而无法干的事情，为当时国内赤烈的爱国运动谱写了一首首战歌。远月 15 日和他接连在上海《民国时报》副刊《觉悟》上接连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向广大人民宣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压迫和剥削，在理论上帮助中国广大先进知识分子辨清了真假社会主义。远月 20 日，又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潮》一文，一方面声援营救陈独秀，另一方面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新思潮。远月 26 日到 28 日，他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连续发表九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为当时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直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参考和指导。

为了适应“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广大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期望，他从 1919 年秋到 1920 年夏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呕心沥血，花费大量精力翻译了

《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在国内出版。这三部书在当时影响极大。仅《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到 1924 年就重版十四次之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一书被李大钊指定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必读之物。

1924 年夏，李达结束了在东瀛的求学生涯，启程归国，准备“找同志干社会革命”。他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取得了联系，并于同年八月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同年十一月七日，即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之日，上海组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李达任该刊主编，该刊的许多重要文章都出自他手。该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最多时发行量达 2 万份，是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教材，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它为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李达在六平方米的斗室里，在北洋军阀的刺刀下，在资金和人手都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以杰出的才干和惊人勇气，承担了从撰稿、审稿、校对到发行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该刊得以生存下来。同时，李达还参加了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创办了《劳动界》周刊，他以此两刊为主要阵地，参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了当时大论战中的主角。他是声讨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派的“中坚”。李达发表《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任公》、《张东荪现原形》、《劳动和社会主义》等文章，批驳了梁、张研究系所鼓吹的“中国——猿源——

无劳动阶级”的谬论。他斥梁、张一类为“走狗学者”的假社会主义，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批驳了梁、张之流所鼓吹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等反动谬论；揭露了他们“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反动实际，指出“中国是劳动力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因而马克思主义也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唯一出路并不是象梁、张之流所鼓吹的那样，“奖励”资本家，“发展实业”，而是要“采用社会主义”。“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不过是梁、张之流玩弄的麻痹工人阶级意识的阴谋。李达还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将，他在《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剖析》等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绝对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谬论。他指出，必须区分根本不同性质的国家，因为“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不能妥协的一个证据”，“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要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资本阶级的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特权）”“绝对自由”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在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同时，李达又发表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对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批评。指出，第二国际是在“和资本家妥协”，在搞“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国际共产党联盟（即共产国际）的主旨就是要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他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丧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议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议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劳动阶级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修正主义热衷阶级调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李达在这次关于社会性质大论战中表现出出色的才干，他无愧于称得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理论家。正因如此，他在“一大”中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担当起了全党的宣传工作。1921年12月，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李达的亲自主持下创立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出版了马列主义著作十五种。李达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几乎单独承担了著译书稿、编辑、校对、付印、发行等全部工作。

李达还负责了党的妇女宣传工作，1921年12月，他担任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的校长。并亲自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党培训了一批杰出的妇女干部。1922年12月，他又指导编辑出版了《妇女》半月刊，发表过诸如《妇女运动史》、《女子解放论》、

《女性中心说》、《产生限制论》、《社会主义的妇女观》等一大批文章，此刊成为当时对广大妇女宣传的中心，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4年秋，李达携家返湘，与毛泽东合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亲自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12月，他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一文，痛斥了江氏的改良主义谬论。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次年1月，他又与毛泽东合作，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并亲任主编。他发表了《何谓帝国主义》、《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文。他与毛泽东合作，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重大问题。由于《新时代》月刊的巨大影响，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恐惧，12月，此刊即被其派兵强行查封。

1925年夏，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李达与陈独秀产生分歧。李达主张要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才能与国民党合作。在他们争议中，陈独秀又表现出家长式的独断专横，为此，李达愤而中断了与陈独秀的联系，是年秋，进而宣布脱党，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尽管如此，李达从来就没背弃过自己的信仰，他一如既往，不屈不挠地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保持着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本色。

白色恐怖下的信仰

大革命失败以后，李达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大学合

法讲堂，向广大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尽管他脱离了共产党，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信仰。他蔑视强暴，追求真理，以自己博大的知识，完美的人格，刚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白色恐怖中，正气凛然地向广大学生宣传着马克思主义。

1945年，李达受当时左翼社会科学家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之托，前往上海法政学院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1946年秋，他又到暨南大学教授辩证唯物主义，次年他又接替许德珩担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高深的理论修养，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深深地吸引了学生们。每次讲课，教室总是座无虚席，有些外校学生也来听他的课。学生们如饥似渴、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教室里鸦雀无声。有胆敢在课堂上捣乱者就会立即被撵出教室。学生们尊敬他、敬佩他、感激他。东方白曾在上海法政学院听过李达的课，近半个世纪后，他回忆说：“我一直怀念和感谢李达老师，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他在我的思想上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老师。”但是，视马克思主义若洪水猛兽的国民党当局却无法容忍他，千方百计地威胁他、解聘他。1948年10月，暨南大学反动当局借口“一·二八”迁校之机，把李达解聘了。

1948年10月，李达抵达北平。由于他在进步学生中的崇高威望，学生们强烈要求学校当局聘用他。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是李达留日同学，两人私交颇深。白鹏飞顺应广大学生的要求，聘李达为教授兼经济系主任。然而，当时的中国大学却被反动当局所控制，拒不接受学生们的意

见。结果，学生们与校方的矛盾激化，学生们不得不向反动校方发出最后通牒：不聘请李达为教授，学生们就集体罢课。最后，在学生们强大压力下，反动校方不得不让步，聘李达为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从1934年到1939年上半年这五年时间，李达是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教书渡过的。其间在1935年缘月曾一度受党组织委托，到张家口为冯玉祥将军讲过一段时间的课。在这五年当中，他在课堂上运用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分析中国的客观形势，启发学生的革命意识。他在课堂上，言简意赅，往往开门见山，以他渊博的知识，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分析问题往往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对广大学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是当时“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除了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外，李达还注意与进步学生交往，直接教育和引导进步学生。而进步学生也把他当成是知心朋友，有什么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李其驹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当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回忆说：“他（李达）对形势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抗日战争前夕，我曾想转学到其他地方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会全面入侵中国，我们呆在北平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你转到别的学校去学不到什么东西。’他劝我利用短暂可贵的时间多学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斗争的准备，以后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我听从了他的劝告，受益匪浅。”

争夺大学讲坛，就是争夺对青年宣传的阵地，就是争夺青年，争夺未来。作为当时北平著名“红色教授”的李达，当然是国民党当局所无法容忍的，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刁

难他，威胁他，软硬兼施地拉拢他，利用政治淫威解聘他，企图剥夺李达的教授权。当时，国民党中央教育部为了解聘进步教授，明文规定，学校每年对该校教员进行重新聘定。李达是当时国民党当局重点要解聘对象之一。广大进步学生为了保护李达等进步教授，每年都要进行斗争。而学校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上的考虑，也不得不聘用象李达这样有希望的教授，这样一方面可以缓和与学生与校方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招徕生源。正如李达当时常对吕振羽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来，学校就会关门。”李达就利用学校与国民党当局这种利益上的冲突，组织学生，进行斗争。

1936年 远月，抗日战争迫在眉睫，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建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宣言，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李达领衔签名，发起了 1936 年各界知名人士签名声援活动。当时，北平教育界与全国一样出现了分裂。以胡适、傅斯年、蒋梦麟为首的北大“独立评论派”，高呼和平口号，拥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以李达、陈隐豹为首的另一派，主张抗战救国，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针对蒋介石所说的：“和平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投降论调，李达在课堂上公开嘲弄说：“照这样下去，读书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读书；抗日不到最关头，决不轻言抗日了。”对此国民党当局火冒三丈，以“侮辱领袖”之名，国民党教育部长王世杰亲自电令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立即解聘李达，还派教育部总务司长亲自坐镇北平，督办此事。国民党当局为此大动干戈，吵吵嚷嚷忙乎了几个月时间，还是没

有结果。最后因李达返湘探望病重的父亲，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作为著名的“红色教授”，李达注定要受到国民党的压制、排挤和打击，也注定了他抗战八年中的颠沛流离和穷困潦倒。“七·七”事变后，他应广西大学之聘，准备去桂林任教。但是，当他历尽千辛万苦，绕道香港经广东到达桂林时，广西大学当局却经不住国民党当局的压力，被迫解聘了他。不得已，李达只好回到故乡零陵隐居。1938年猿月，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顶住当局压力，聘请李达为经济系教授兼主任。李达在广西大学讲了一年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次年底，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前往重庆主持研究室工作，并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辩证逻辑，对冯玉祥将军产生重大影响。1939年怨月，他又谢绝了冯玉祥将军的挽留，决定离开重庆，前往广西大学任教。去时他致信冯玉祥，劝其退出国民党，专事抗日民主运动。“冯玉祥将军读到此信后，把有的地方加以密圈密点，有些地方还加上顶批，说道：‘这里算我的箴言宝典，我要留之座右，我要终身不忘。’……”当李达到达桂林时，他的老同学白鹏飞却由于坚持要聘用李达而丢掉了饭碗。李达当然也就绝难幸免，迫于生计，只好在七星岩附近的祝圣里摆杂货摊为生。1940年春，他又流归故里，是年秋又应聘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任教。未期一年，国民党教育部又干戈相向，电令中山大学解聘他。主持校务的林励儒先生生性耿直，据理抗争，为李达申辩，结果连同李达一起丢掉了饭碗。李达又一次流归故里。在家乡卖烧酒为生，同时也间或寄情山水，垂钓湘江，著书立说度日。

“三十三年走日本”，这是李达故乡人至今还时常提起的一句话。零陵虽偏居湘南一隅，但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它南通五岭，北扼两湖，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2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零陵是其必占之地，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一败涂地，愿月，零陵陷落，李达家紧靠国民党在湘南的一个战略空军基地，自然无处可藏。于是，李达就不得不携妻子石曼华等。“走”起了日本。南边道县的大徯山，山势险峻，古木苍天，是逃难者的理想去所，可也是土匪栖身的好地方。李达随着人流，在这里“走”日本。结果，他的全部家当都成了土匪的“战利品”，连同他长期以来笔耕的成果和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全都难逃此劫。李达在躲躲藏藏中流离了一年多，才在抗战胜利鞭炮声中，回到了故乡。然而，抗战胜利，却并没有给李达这样一位“红色教授”的生活带来任何转机。他被国民党当局冷落一边，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不得不操起了卖烧酒这门行当。直到1945年，经多方努力，他才被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可国民党却给了他立了个“三不准”政策；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演说、不准在家接待学生。另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李达也是名列榜首。湖大当局还故意刁难，不许他讲他自己轻车熟路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却“封”他个法律系教授，让他讲授他还不太擅长的法理学，企图以此阻止他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李达以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渊博的知识，超凡的精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出了《法理学大纲》这马克思主义法学巨著，把国民党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充分地利用湖大合法讲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